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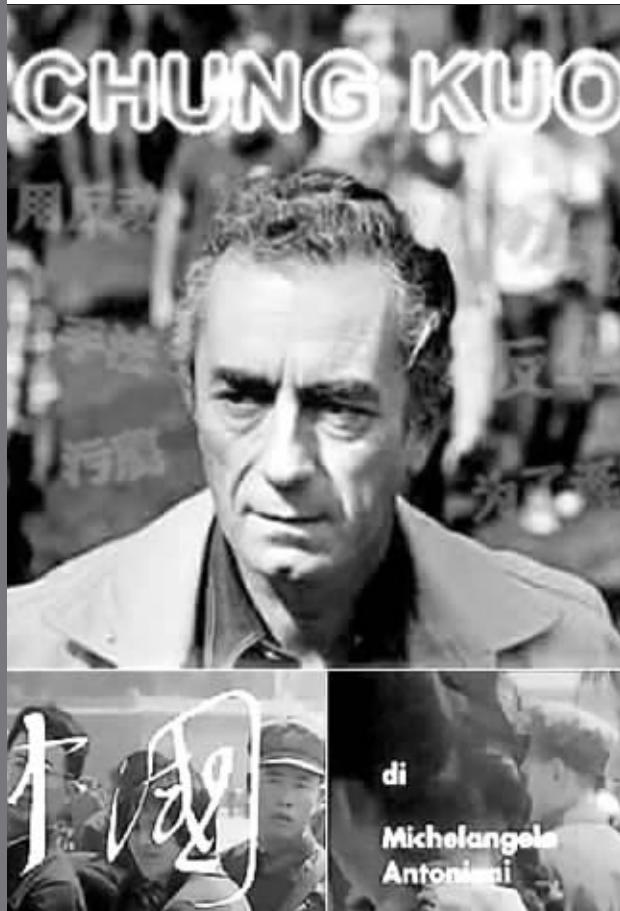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,除了几部革命样板戏,中国通过电影留给我们的记忆差不多是空白。

就在那个年代,1972年5月13日,一支意大利电影摄制组顺利到达中国,先后在北京、河南林县、南京、苏州、上海等地取景,拍摄了一部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纪录片《中国》。虽然在那个特殊年代,影片没在国内公映,但围绕这部影片却掀起了轩然大波,看过的、没看过的,所有的人都旗帜鲜明地一起批判这部电影和它的导演……

电影《中国》到底讲述了什么,以致引起如此巨大的愤怒?

安东尼奥尼的南京之行

- 当年,安东尼奥尼在南京留下了什么样的行迹和故事
- 电影《中国》拍摄了南京的哪些镜头,为什么会是这些地方
- 这位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究竟想拍什么



纪录片电影《中国》的海报

一位外国导演与一部“反华电影”

1972年,来中国的那年,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·安东尼奥尼已60岁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以当时的大环境而言,国外摄影组能来中国拍摄并非易事,而此摄影组却有着难以想象的“特权”——是外交部特批来的。

来者即是客,摄影组自然受到了中国方面的礼遇。一个中国小组负责接待,这个小组在整个拍摄期间都限随左右,小组成员包括政治负责人、电影专家等。

接下来的日子,他们先后辗转北京、河南林县、南京、苏州、上海等地取景,南京也成为重要拍摄地。《中国》拍摄时间长达一个月零两天,所用的16毫米彩色片近九万英尺。

意大利导演拍摄的《中国》究竟什么样?在长达一年的等待中,《中国》始终没能在国内公映。1974年前后全国一下子掀起了对《中国》的大批判。《中国》被定性为“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,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”。

一位意大利来的客人瞬间变成了一名“反动分子”。而电影中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一段镜头“收获”了最多的批判。“拍摄大桥全景时,晃晃悠悠,降低了大桥的高度,没有拍出威严,镜头一转竟拍到了晾晒的裤子……”

神秘的《中国》究竟拍摄了什么

2004年12月4日,北京电影学院举行“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映”,《中国》第一次在国内上映。这场迟到的公映,让人们真正见到了这部电影的真面目。那泛黄的胶片里涌动着真切的影像,灰绿小褂、解放装、黑布鞋、姑娘们羞涩的面容和粗粗的长辫,勾起了过来人对那个年代的回忆。

如今不论在百度上还是在谷歌上搜索“安东尼奥尼的《中国》”,都能找到这部当年被严禁传播的电影,这是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,共分三个部分。

拍摄从北京开始:童声中的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天安门广场上等着和天安门合影的年轻人,行走的普通市民,专心练太极拳的老人等;接下来,影片中的镜头切换到了河南林县的红旗渠,还有河南的集体农庄;再接着,是苏州、南京和上海。

在影片中,展示了一段对产妇针灸麻醉,然后进行剖宫产手术的全过程,让人印象深刻——从医生将长长的银针插入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,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,过程很详细。

而长江大桥的出现,让人们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南京。纪录片给了南京整整22分钟的镜头,摄影师随意地跟拍,

记录着当时人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,镜头里的人脸上显露着疑惑、好奇、羞涩、甚至戒备,一切都那么自然。

南京的五老村、长江大桥入镜头

细细看影片中关于南京的片段,不难发现,最多的镜头给了五老村:小学门口的学生们整齐划一地排队行走;诊所里的医生在给病人看病;幼儿园天真可爱的孩子在表演节目,跳舞、唱歌、耍红缨枪……

而曾经让国人骄傲无比的长江大桥,在电影镜头中只有一个远远的截面。

影片的解说词是意大利语的,大致是这样描述南京的:

“南京曾是一个灯红酒绿的首都,是辉煌的明朝的执政地,现在它是一个工商中心。在内战和解放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”

……

最令南京人骄傲的也许是他们的学校,每个区都有幼儿园,掌管在革命委员会的手中。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,一半人口的年龄不到20岁。但孩子是最受关爱的,他们从小就接受集体生活的教育。他们安静、听话,一点都不任性。”

从电影拍摄的内容来看,应该说是忠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,然而,就是这样一部看似普通的影片,从一开始拍摄,就饱受争议,在拍摄中,“刁钻”的导演安东尼奥尼也屡次给接待人员“出难题”。

安东尼奥尼在南京还想拍军事演习和监狱

1972年,那是崔岩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的第三年,31岁的崔岩是英语翻译。

在崔岩的记忆中,在他负责接待工作的生涯中,安东尼奥尼是唯一一位以外籍导演的身份受到接待的,无疑也是一位“最难缠”的外宾。

安东尼奥尼是1972年6月1日上午到达南京的。而之前,江苏省外事办已经收到外交部发来的函,其中就提到了安东尼奥尼在北京和林县拍摄时喜欢自作主张,安排好的节目不拍,没安排好的硬要拍。

接到函以后,省外事办特意为安东尼奥尼一行制作了一份日程表。大致内容是:6月1日上午73次火车9:36车站迎接;下午游玄武湖、市容;晚上便宴,观看红小兵的演出。6月2日上午参观南京长江大桥;晚上观看长江大桥夜景。6月3日上午游览中山陵;下午参观紫金山天文台(准备鲁迅中学)。6月4日上午45次火车8:37送走。

接待的情景,崔岩记得对

方是一行七人(注:其中电影摄制组成员共4位),由北京的张文润陪同,“60岁的安东尼奥尼略显老态,中等身材,穿着休闲,话不多。”

没想到的是,在6月1日看完日程后,安东尼奥尼眉头紧锁,居然提出要拍军事演习和监狱。当崔岩把这些翻译给在场接待人员时,大家面面相觑,“要知道在那个年代,不开放的单位是绝对不允许拍摄的。”

在经过一番讨论后,定下的初步拍摄对象是:市容、玄武湖、长江大桥、中山陵、天文台和红小兵的演出。而陪同人员除了崔岩,还有广播事业局的陆更生、钱惠民,保卫组的张振祥。

“五老村”为何成了南京的主角

崔岩记得安东尼奥尼当天下午本要求去看市容。从双门楼宾馆出发,到新街口、三山街、反帝北路(太平北路),一直行进到五老村附近,崔岩向安东尼奥尼介绍说:

“解放前是个贫民窟,而现在是南京的模范社区。”这似乎一下子激起了安东尼奥尼的兴趣,他要求马上下车去拍。

当时五老村街道是南京的开放单位,因为卫生工作做得好,1952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甲等模范单位,荣获毛泽东亲笔题词的一面锦旗,周恩来、陈毅还曾到此参观,先后接待了不少外宾。事前考虑到安东尼奥尼会看居民区,外事办早就打过招呼,让五老村街道做了准备。没想到他真来了兴趣,中了崔岩他们的下怀。

高鼻梁的安东尼奥尼进入社区后,身后跟了一群看热闹的“追随者”,大家说笑着、议论着。

崔岩观察到,尽管一路上街道接待人员滔滔不绝地介绍,他不停地翻译,可安东尼奥尼却有些漫不经心。突然,安东尼奥尼对路边的几个姑娘产生了“兴趣”。那几个女孩都是蓝灰小褂,穿着略显土气,面对意大利导演犀利的目光,个个都羞红了脸。崔岩只得特意上去打了声招呼,“同志,这是意大利的外宾,来拍摄关于南京的纪录片,配合一下。”姑娘们这才微笑着答应了。

五老村小学里的学生、诊所,还有五老村幼儿园都是在那时拍摄的,长达一天的时间。“他几乎没有和拍摄的人交流过,也从没停下教他们怎么做、如何做。几乎是随意、随性、最自然的记录。”

船厂内晾晒的裤子遭偷拍、红小兵表演“流产”

当天,安东尼奥尼似乎对

长江大桥兴趣并不大,介绍情况时,已经显得很不耐烦。原本计划要拍摄一天的长江大桥,不到半天就草草收尾。

崔岩当时介绍得十分卖力。“原本这里是天堑,分割了南北,造起这座大桥很不容易,钢材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。”陪同人员的意思很明了,希望安东尼奥尼能多给些镜头,从正面拍摄。可他却吊起了长长的摇杆,当时的陪同人员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。直到后来批判时,才知道长江大桥那段出现了晾晒的衣服。崔岩这才恍然大悟。“估计当时这镜头就是摇杆伸到船厂拍摄到的。”

而红小兵的演出曾经也是铁板钉的拍摄内容,那时的红小兵也就是后来南京小小红花艺术团的前身,挑选出的孩子都是精英。在观看了孩子们卖力的演出后,安东尼奥尼向崔岩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,“孩子的演出似乎太一板一眼了,能否让孩子多发挥点天性,自然一些。”

安东尼奥尼又说,拍摄的片子一看就是给外国人看的,是否可以改到草坪上,或是到红小兵所在的学校演出。崔岩把这句话翻译给接待组负责人王伦之,王伦之思虑再三后说:“红小兵不是一个学校的,这样做有点困难,在草坪上演,灯光也不好办。”

安东尼奥尼接着又提出,能否用红布把大厅周围的墙遮起来。王伦之的头显然有点大了,“这样做有困难。”两人的谈话中有些僵持不下的意思。王伦之最后询问时是这样说的,“条件就是这样了,是否接着拍摄?”安东尼奥尼斩钉截铁地说不拍了,就这样取消了拍摄红小兵的项目。

两架摄影机同时拍,其中一架作假

安东尼奥尼话虽不多,但他对崔岩提得最多的要求是,“我们不要人陪,你们派个司机带着我们到处兜兜就可以了。”可在当时,这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崔岩每天陪同拍摄后,还要和其他陪同人员一起向外事办的主任汇报一天的情况,“例如外宾一天做了什么、说了什么、态度如何,等等。”

“陪同人员发现安东尼奥尼其实早已洞察到他身边有保卫组的人员。几次和小张(张振祥)有过争执,说他是便衣。监视他们拍摄。”崔岩坦言,事实上在当时的大环境下,像安东尼奥尼这样的重点外宾是要“保护”的,包括他所住的房间周围都有人员守着。

于是这个固执有主见的老人,有时候还会耍耍小脾气,有一次索性就不拍了。他对崔岩说:“崔同志,你辛苦了,回去休息吧。我今天也不出去了。”

可当崔岩回到办公室没多久,就接到了保卫组陪同人员张振祥的电话。“他们又出去了。”当崔岩赶到宾馆时,安东尼奥尼一行人早已悄悄跑到双门楼附近的一个小菜场拍摄去了,和他们玩起了“捉迷藏”。

安东尼奥尼也有“招”,在后来的拍摄中,他们竟然拿出了两部摄影机。一天下午,安东尼奥尼要求乘车出去转转,南京方面认为解放广场比较整齐,就安排他们去了。但他们到达解放广场后即直奔中山桥,在桥下南北各设了一架摄影机。“当时我们有些懵了。”不懂得摄像的陪同人员左瞧右看,不晓得他们究竟拍了些什么。

后来崔岩才知道,桥北这架是假动作,以便转移群众视线。桥南这架大肆拍摄行人和上坡板车,并装上长镜头朝中山码头方向拍摄。

其实他想拍摄的是中国的人

在四天的接待工作中,崔岩发现了这么一点,安东尼奥尼对于所安排的南京名胜古迹并不感兴趣。而6月3日下午,从建宁路到中央门的路上,安东尼奥尼却如获至宝般地发现了路旁一个摆茶摊的老太。在他的要求下,崔岩下车去问了老太。“对于什么是拍摄老太都不清楚。她只是摆手。”安东尼奥尼这才作罢。

在鼓楼广场时,是他随意捕捉人物最好的时候。当时来往的车辆行人很多,安东尼奥尼尽情拍着环卫工人、公交车,尤其对拉板车的老人产生了兴趣。

崔岩说,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,南京方面想让安东尼奥尼拍摄南京的新风貌、伟大的建筑和名胜古迹,而他偏爱钻小巷子,偏爱拍摄那些最普通的市民、穷苦的茶摊老太、拉板车的老人,等等。

可到今天,崔岩想起当时的拍摄情景倒是很能理解。“他要反映的不是中国,而是要反映中国人,他们是怎样生活和劳动的。是一种写实的拍摄手法。”

本版主笔

快报记者 沈晓伟 赵丹丹



影片中的长江大桥



大桥下船厂内晾晒的衣物被拍到了镜头